

北京市生育政策调整 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

王广州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在全面分析北京市户籍人口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孩次结构、独生子女比例、婚配模式、人口迁移和生育意愿的基础上, 本文分析了北京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户籍人口放开单独对北京新增出生人口的影响非常小, 2020 年以前每年对北京市户籍人口出生规模的影响在 1 万 - 2 万人左右, 远远低于迁入人口规模的影响。

[关键词] 生育政策; 生育水平; 出生规模; 放开单独

[中图分类号] C9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054 (2011) 03-0048-05

回顾三十多年来的人口计划生育历史, 北京走上了人口规模持续膨胀、生育水平持续降低的发展道路。从北京人口的发展特点来看, 人口变动一方面取决于出生、死亡人口规模的变化, 更重要的一方面则取决于人口的迁移流动。尽管北京育龄妇女的人口规模持续增加, 但生育水平却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以下, 1974 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下降到 1.72, 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 年 1%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 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 0.6742, 属于超低生育水平。即便考虑到生育进度和分母效应, 可以肯定目前生育水平在 1.2 以下。显然, 这样超低生育水平对总人口增长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北京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压力是人口迁入和流入规模的迅速扩大。从北京户籍人口每年的出生规模变动可以明显地看到, 目前户籍人口出生规模已经由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七万人左右下降到目前的五万人左右。虽然近几年受时间和属相生育偏好的影响, 北京市育龄妇女生育水平有所波动, 出现出生人口堆积的现象, 但整体上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状况仍处于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户籍人口

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必定带来户籍人口快速老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 生育政策的完善和调整将是历史的必然。本研究以北京户籍人口为研究对象, 试图分析完善、调整北京户籍人口生育政策可能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

虽然生育政策的完善和调整是以育龄夫妇的孩子数量和结构为政策依据, 但要分析政策变动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必须对生育水平、育龄妇女孩次结构与人口规模、育龄夫妇的个人独生情况、婚姻状况和生育意愿进行全面地分析和深入地研究。目前通用的人口分析模型和人口分析方法无法满足这一研究任务的需要。为了解决开放人口系统分析模型的构建方法问题, 本研究认为出生人口规模的确定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 一是户籍人口, 二是迁入人口。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管理条例是以户籍人口与农业非农业属性为划分标准的, 因此人口预测模型采用农业非农业的递进人口发展模型, 同时考虑迁移人口的进入。人口预测模型的整体架构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 将新增迁移人口不断加入户籍人口系统之中, 对新增迁移人口采取不同的规模估计并假定其迁入

[收稿日期] 2011-01-03

[作者简介] 王广州 (1965 -), 男, 黑龙江省宁安市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 (YZDA2010-45)

后的人口过程与户籍人口相同。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为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和 2008 年北京人口计生委 WIS 系统数据。

一、北京市生育水平的变化

生育政策完善和调整的直接后果是引起生育水平的变动,即出生人口的增加。生育水平的变动情况取决于育龄妇女的生育进度和终身生育状况。通常分析生育水平采用总和生育率指标,但总和生育率指标没有区分生育孩次的结构和进度,因此,与政策的联系不是十分紧密。所以本研究采用总和递进生育率和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来分析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变动情况。

1. 总和递进生育率

与总和生育率相比,总和递进生育率更接近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而且更能反映妇女生育的孩次构成。

育龄妇女的总和递进生育率由 1990 年的 1.2366 下降到 2000 年的 0.9423,2005 年下降到 0.8925。2000 年与 1990 年相比主要表现在 1 孩->2 孩递进,其次是 0 孩->1 孩递进。而 2005 年与 2000 年相比总和递进生育率下降主要表现在 0 孩->1 孩和 2 孩->3 孩递进,1 孩->2 孩递进却处在上升的趋势中,这恰恰体现了计划生育条例修改的影响。

从各年度孩次总和递进生育率的构成来看,1990 年 0 孩->1 孩递进生育率占总和递进生育率的 78.37%,2000 年上升到 92.09%。2005 年 0 孩->1 孩递进生育率占总和递进生育率的比重略有下降,下降到 90.39%。与 0 孩->1 孩递进生育率的比例变化方向相反,1990 年 1 孩->2 孩递进生育率占总和递进生育率的比例为 18.56%,2000 年下降到 7.86%。2003 年修改的计划生育管理新条例的影响主要是针对 1 孩->2 孩递进生育,2005 年 1% 抽样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点。2005 年在总和递进生育率下降的前提下,1 孩->2 孩递进生育率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7.86% 上升到 2005 年的 9.21%。而 2 孩->3 孩递进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中,其递进生育率的比重由 1990 年的 3.08% 下降到 2000 年的 0.53%,2005 年更下降到 0.4%。另外,从 2005

年生育水平的构成来看,农业人口明显高于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总和递进生育率为 1.1424,而非农业人口仅 0.7795。

2. 35 岁以上妇女终身生育水平

从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来看,北京已完成生育的户籍人口妇女队列终身平均生育子女数迅速下降,如户籍人口中 64 岁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为 2.31,其中农业人口平均生育子女数为 2.63、非农业人口为 2.17;54 岁户籍妇女的终身平均生育子女数则迅速下降到 1.50,其中农业妇女下降到 1.96、非农业妇女下降到 1.34。十年内户籍妇女平均终身生育子女数减少了 0.81 个孩子,其中农业妇女减少了 0.67 个,非农业妇女减少了 0.83 个。而 54 岁到 44 岁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速度趋缓,户籍人口中 44 岁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下降到 1.18,其中农业妇女下降到 1.61、非农业妇女下降到 1.02。从下降的幅度来看,户籍人口平均下降了 0.32 个孩子,其中农业妇女下降了 0.35 个孩子,非农业妇女下降了 0.316 个孩子。可见,农业与非农业妇女下降的幅度大体相同。从上述各个队列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北京户籍妇女早已经完成了由更替水平以上向更替水平以下的迅速下降过程,目前已经进入平稳下降阶段。从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来看,农业和非农业妇女生育水平有明显差异,44 岁以上两者的差距比较稳定,44 岁以下两者的差距有迅速缩小的趋势。这意味着农业妇女终身生育水平有迅速接近非农业妇女的趋势。而非农业育龄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保持在 1.0 左右。

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用总和递进生育率还是用终身平均生育子女数来衡量,北京市育龄妇女生育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育龄妇女的平均终身生育水平已经降低到 1 以下。在整体下降的前提下,2 孩生育水平受计划生育条例等因素的影响已表现出上升的趋势。3 孩生育水平则处在显著的下降过程中,且占总和递进生育率的比重已经不足 5%。

二、育龄妇女孩次结构

育龄妇女的孩次结构不仅是妇女生育的历史积累,而且决定未来生育过程和生育潜力。孩次

结构的变化过程反映妇女由0孩、1孩、2孩…的生育递进过程,是对妇女生育状态和属性动态变化过程的描述。比较2000年、2005年和2008年育龄妇女孩次结构可以发现:第一,2008年3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75%已经生育了1个孩子,而2000年75%以上的妇女生育了1个孩子的年龄为31岁以上。与2000年相比,50%以上育龄妇女已生育1孩的年龄组由2000年的27岁提高到2008年的30岁;第二,49岁妇女终身只生育1个孩子的比例由2000年的60%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70%以上;第三,49岁妇女终身生育2孩的比例由2000年的30%以上降低到2008年的20%左右;第四,49岁妇女终身生育3孩及以上的比例由2000年的6%以上降低到2008年的2%左右;第五,2008年35岁以上妇女的孩次结构非常接近。也就是说,最近十几年来北京妇女的孩次结构稳定在相近的生育目标上。

通过比较队列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下降过程和与不同时期生育水平下降过程相对应的育龄妇女孩次构成发现:①目前育龄妇女孩次结构逐渐朝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在1孩和2孩占绝对优势的生育目标上趋于稳定。目前已经基本稳定在1孩的妇女占75%以上,稳定在2孩的妇女在20%以内,稳定在3孩的妇女在4%左右。②3孩及以上生育的特殊情况已经很少见了,与之相对应的是35岁以上育龄妇女没有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2005年35岁以上的育龄妇女没有生育的比例已经达到4.8%,其中35岁仍未生育的比例高达11.79%,而1990年35岁未育的比例仅为4.08%。

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农业人口生育2孩的比例迅速下降,49岁生育2孩+的比例在58.49%以上,45岁下降到46.31%以内。

三、独生子女比例估计

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得到的年龄别1孩比例来看,随着年龄的降低,年龄别1孩比例逐渐上升。30岁户籍人口1孩比例在25%左右,18岁户籍人口年龄别1孩比例上升到65%—80%左右。

北京15岁以下非农业户籍人口中,无兄弟

姐妹的比例都在90%以上,这从另外一个方面验证了非农业妇女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超低生育水平。另外,从非农业户籍人口1孩比例可以看到,户籍人口独生比例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为30—24岁,该阶段为急剧上升阶段,年龄别独生子女比例从28%上升到75%;第二阶段为24—12岁,该阶段为波动上升阶段,年龄别独生子女比例从75%上升到90%以上;第三阶段为12岁以下,该阶段为平稳阶段,年龄别1孩比例一直稳定在92%以上。

户籍人口中年龄别1孩比例的差别主要是农业和非农业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别很小。与非农业户籍人口明显不同,农业人口中年龄别1孩比例一直低于非农业人口,但一直处于上升过程。农业人口中1孩比例由30岁的15%左右上升到0岁的90%左右。

虽然户籍农业和非农业人口年龄别1孩比例存在很大差别,但1孩年龄别领证的比例却非常接近。从2008年户籍人口年龄别1孩领证比例可以看到两个特点:第一,0—5岁是1孩领证率上升最快的阶段,5岁以后上升相对比较缓慢;第二,大约有10%左右的事实独生子女没有领独生子女证。1孩领证率15—18岁基本达到最大,达到90%左右。

四、育龄夫妇婚姻结构

目前北京市已婚育龄夫妇年龄分布比较稳定。丈夫的年龄大于等于妻子年龄的比例在85%以上,小于妻子年龄的丈夫比例在15%以下,30%左右的夫妻年龄相等。

不同年代初婚的丈夫与妻子的婚龄差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丈夫和妻子同龄的比例从1986—1990年结婚队列的35%下降到2001—2005年队列的28.76%;二是丈夫年龄大于妻子的比例由1986—1990年结婚队列的51.69%上升到2001—2005年队列的62.32%;三是婚龄差的分布呈现由集中到离散的趋势。

五、生育意愿分析

根据2006年北京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侯亚非、马小红等,2008)的原始数据进行加权调整后得到:第一,19—34岁独生子女中不

打算要孩子的占 10% 以上；第二，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在 30% - 40% 左右；第三，打算生育 3 个及以上孩子的在 1.5% 以内；第四，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生育意愿有升高的趋势。

根据调查数据还可以推算出独生子女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在 1.3 以内，即，独生子女中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比例在 40% 以下。根据日本的生育意愿研究经验，虽然日本的生育意愿在 2.1 左右，但实际生育水平远远低于实际生育意愿。因此，如果户籍人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可靠的话，那么，北京独生子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一定低于 1.3。

六、人口迁移

迁移和流动都是直接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和出生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从人口迁移的角度看，北京是人口净迁入城市。最近十年来，每年净迁入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已经由 20 世纪 90 年代六七万人增长到 2000 年以后的十四万多人，目前净迁入人口规模远远大于每年北京市出生人口规模，主要原因是迁入规模持续增长，而迁出人口规模则相对比较稳定，1997 年以来基本稳定在四五万人左右。

由于基础数据等方面的原因，对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研究比较少，根据梁在等（2004）的研究，我国迁移人口年龄结构主要集中在 15 - 59 岁。2000 年人口普查表明，15 - 59 岁永久性移民占移民总量的 89.12%，其中 15 - 44 岁永久性移民占 83.83%。

北京市户籍人口迁移与全国的迁移人口基本特征略有不同，年龄构成的集中程度相对较低。根据 2000 年和 2005 年户籍人口年龄，运用人口年龄结构间接估计方法可以推算 2000 - 2005 年年龄别净增迁移人口情况。净迁入人口总体上男女年龄结构分布基本相同。在 2005 年净迁入的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 30 岁以上和 5 - 14 岁年龄组。

虽然净迁出主要集中在 15 - 30 岁年龄组，但净迁出人口年龄结构性别差异明显，女性净迁出人口年龄低于男性，主要发生在 15 - 24 岁，男性主要是 25 - 30 岁年龄组。就严格意义的户籍人口迁移来说，北京净迁入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分散，15 - 59 岁年龄组净迁入人口占总净迁入人口的 60% 左右，与全国的平均状况有很大差距。

七、生育政策调整对出生规模的影响

完善生育政策主要是对独生子女生育二孩政策的调整，按照目前的独生子女比例，如果 90% 的领证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话，二孩的递进生育水平大体如表 1。

表 1 生育政策调整参数估计

| 参数 | 2010 年 | 2020 年 |
|---------------|--------|--------|
| 农业人口男性平均预期寿命 | 73.34 | 73.78 |
| 农业人口女性平均预期寿命 | 75.55 | 76.11 |
| 非农业人口男性平均预期寿命 | 78.37 | 78.78 |
| 非农业人口女性平均预期寿命 | 80.73 | 81.55 |
| 非农人口比例 | 72.45 | 76.53 |
| 净迁入人口（万） | 15 | 15 |
| 农业人口二孩递进率 | 0.24 | 0.6 |
| 非农业人口二孩递进率 | 0.44 | 0.8 |
| 农业人口总和递进率 | 1.23 | 1.59 |
| 非农业人口总和递进率 | 1.23 | 1.59 |

数据来源：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

考虑到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水平，如果只针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采取“单独”可以生育二孩政策，且符合政策的妇女 30% 生育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的下限），那么，农业人口 2020 年总和递进生育率将上升到 1.23 左右。与政策不发生变化相比，每年预计多出生 1000 - 3000 人。

同样，如果只针对农业人口独生子女采取“单独”可以生育二孩政策，且符合政策的妇女 50% 生育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的上限），那么，农业人口 2020 年总和递进生育率将上升到 1.35 左右。与政策不变相比，每年预计多出生 1000 - 6500 人。

如果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单独”都可以生育二孩，且符合政策的妇女 30% 生育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的下限），那么，农业人口 2020 年总和递进生育率将上升到 1.23 左右；非农业人口 2020 年总和递进生育率将上升

到 1.12 左右。与政策不发生变化相比，每年预计多出生 1 万 - 1.9 万人。

同样，如果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单独”都可以生育二孩，且符合政策的妇女 50% 生育二孩（生育意愿调查的上限），那么，农业人口 2020 年总和递进生育率将上升到 1.35 左右；非农业人口 2020 年总和递进生育率将上升到 1.28 左右。与政策不发生变化相比，每年预计多出生 3 万 - 3.5 万人。

参考文献：

- [1] 郭志刚. 北京市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及外来人口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3 (6).
- [2] 郭志刚. 关于京津沪超低生育率中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检验 [J]. 人口研究, 2005 (1).
- [3] 郭志刚. 关于外来人口分母效应的再讨论 [J]. 人口研究, 2005 (4).
- [4] 梁秋生. 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大城市育龄妇女的超低总和生育率—以京、津、沪为例 [J]. 人口研究, 2004 (5).
- [5] 梁秋生. 再论大城市超低总和生育率中外来流入人口的分母效应—与郭志刚教授商榷 [J]. 人口研究, 2005 (2).
- [6] 梁秋生. 京津沪超低总和生育率形成原因的再认识 [J]. 人口研究, 2006 (3).
- [7] 王广州.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我国育龄妇女递进生育史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5 (5).
- [8] 马瀛通, 王彦祖, 杨叔章.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J]. 人口与经济, 1986 (1)、(2).
- [9] 王广州. 人口年龄结构间接估计方法与应用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1 (5).
- [10] 张丽萍. 北京市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北京社会科学, 2008 (4).

总之，北京生育政策的调整对出生人口规模产生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到生育水平变化、孩次结构基础、独生子女比例、婚姻模式变动、人口迁移流动、城镇化进程和生育意愿变化等许多方面，目前的研究也只能是一个比较保守和粗略的估计。如果仅从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差距角度看，目前的分析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估计。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fect of Changing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Birth Population Size of Beijing

WANG Guang-zhou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TFR, ever born children structure, ratio of one-child, marriage pattern, migration population and birth desire, this paper has studied on the effect of changing the one-child policy on the birth population size of Beijing. The effect of the release rural “single child” family is very limited. All “single child” couple with Beijing HUKOU can have two children policy will bring 10 thousand to 20 thousand more birth before 2020 for each year compare to not change the policy. The extra increased population size for each year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increase of the migration population.

Keywords: birth policy; fertility level; birth population size; release “single child” policy